

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学术史

沈海梅

[摘要]因西藏以及中印关系历史问题,作为西方学术领域重要区域研究的喜马拉雅人类学尚较少被中国学者关注。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喜马拉雅将成为中国一个新的学术高地。文章对西方人类学领域中的喜马拉雅研究进行梳理,指出西方人类学的喜马拉雅研究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经历了东方学的研究传统;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经历了欧洲观察者的结构-功能时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演绎着多元化、多主题的学术史历程。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为人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学术遗产。

[关键词]人类学;喜马拉雅研究;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5)08—0001—09

基金项目: 云南民族大学创新团队项目“喜马拉雅向东延伸地带的性别、环境与发展”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沈海梅(1968—),女,云南永仁人,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西南中国社会人类学。云南昆明 650500

喜马拉雅以其绵延2400公里的山脉闻名于世,其海拔8848米的山峰在中文中称为珠穆朗玛峰,在英语中称为埃弗勒斯(Everest)峰,矗立于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边界,是世界最高的山峰。喜马拉雅区域跨越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多国边界,这一地区也以其生态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而闻名于世,因而自18世纪以来就成为西方人类学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区域。因喜马拉雅地域广袤,西方喜马拉雅研究又将整个喜马拉雅区域按巴基斯坦喜马拉雅、克什米尔喜马拉雅、印度西北、北部、东北喜马拉雅,以及锡金、不丹、尼泊尔喜马拉雅进行区域分类。^①喜马拉雅人类学包括这些环喜马拉雅的区域研究和藏学研究,云南藏区也被视为东喜马拉雅的延伸区域。本文对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进行简要梳理,以有助于中国学术界认识该区域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史脉络。

一、18世纪至20世纪早期东方学体系中的喜马拉雅研究

1600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在继葡萄牙和荷兰之后加入到对印度的殖民队伍中,依靠东印度公司这一集商业、政治、军事和司法为一体的机构,英国将殖民活动扩张到尼泊尔、西藏等喜马拉雅核心区域。从西方殖民势力进入喜马拉雅地

区,殖民官员、探险家对印度、尼泊尔等国的描述,开启了喜马拉雅人类学民族志的启蒙时代。^{[1] P.163}1792年,英国与加德满都印度人建立更为密切的经济关系,在印度任职的英国军官柯克帕特里克上校(Kirkpatrick, W)首次与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1811年出版巨著《尼泊尔王国现状记录:1793年使团对这个国家的观察》,^②详细记录了在尼泊尔每天的行程路线和见闻,并提供了许多有关尼泊尔社会文化丰富翔实的资料,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另一本记载早期人类学在尼泊尔的故事,是布莱恩·何德逊(Brain. H. Hodgson)所著《尼泊尔与西藏语言、文学与宗教随笔(1874)》,^{[2] P.166}该书是作者1828年至1838年间发表在《孟加拉亚洲社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Bengal Asiatic Society)文章的文集。作者在尼泊尔生活了20年,调查尼泊尔的语言与宗教,能从社会内部洞察尼泊尔的社会与文化,所呈现的查潘(Chepang)和库孙达(Kusunda)文化体现了尼泊尔文化的特征。此外,1847年《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就刊载过何德逊(Hodgson, B. H)所撰的《喜马拉雅次区域的土著》,^{[3] P.1235-1244}他在尼泊尔期间搜集了梵文写经381卷、200多种,“成为西方知道存在梵文佛典的第一人”^{[4] P.3},对西方现代佛教研究做出贡献。

19世纪末,有一定数量与喜马拉雅区域相关

的旅行日志、宗教、种族的介绍、研究著述得到出版,如《在尼泊尔、不丹藏人、锡金、缅甸与阿萨姆邦之间的道路》^③、《印度中部高地的山地部落》^④、《三个封闭的领地:东喜马拉雅的公会前哨占》^⑤。1875年伦敦威廉·布莱克伍德(William Blackwood)出版社出版了安迪·威尔森(Andrew Wilson)的游记《雪屋:从中国西藏穿越喜马拉雅山谷到印度高加索山区的旅途考察》^⑥,说明19世纪以来喜马拉雅区域就受西方学术界关注。18世纪以来的这些作品及呈现的人文景观帮助西方世界确立起对喜马拉雅区域的东方想象,并使早期喜马拉雅研究产生东方学的意义。然而,将这一东方学传统推向高峰的是意大利学者图齐。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间,意大利人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八次赴中国藏区考察,1925年至1954年六次调查尼泊尔,1955年先后在巴基斯坦斯瓦特、阿富汗等地促使考古发掘。^{[5](P.1)}他考察的路线经过冈底斯山、玛郎、噶大克、托林、斯比缔、西姆拉、玛纳里、亥斯密、拉达克、斯利纳加,穿越了喜马拉雅山南北麓的主要地区。1933年图齐在意大利建立中东和远东研究所,主编《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集刊》、《东方与西方》等学术刊物。图齐所著四卷七册本的《印度-西藏》(Indo-tibetica,1932-1941年),三卷本的《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1949年)被国际公认为尚未超越的学术丰碑。^{[5](P.5)}图齐所著的《印度-西藏》四卷被翻译成中文《梵天佛地》出版,第一卷《西北印度和西藏西部的塔和擦擦——试论藏族宗教艺术及其意义》,第二卷《仁钦桑波及公元1000年左右藏传佛教的复兴》,第三卷《西藏西部的寺院及其艺术特征》(第一册第二册扎布让),第四卷《江孜及其寺院》。图齐的这些研究无疑从考古、宗教、艺术领域极大地丰富了欧洲东方学的内容,他对藏地、尼泊尔、印度的考察研究及其所获得的藏学研究10余部著作,100余篇论文,无疑确立了其在欧洲东方学中的地位。图齐对东方社会文化的研究贡献,不仅是在东方学体系中奠定了藏学研究这一核心议题,也因其喜马拉雅南北山麓的穿行和考察而将喜马拉雅研究推向一个高峰。

20世纪初,有英国人E. S. 奥克勒对喜马拉雅区域进行了探访,所著《神圣的喜马拉雅》由伦敦安德逊与弗涅尔公司于1905年出版。1926年,埃贡(Eickstedt, Egon V.)在《印度人类》刊物发表

《西部-中部喜马拉雅的人种与类型》^⑦,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对喜马拉雅区域的历史、人种、社会文化的研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据哥伦比亚大学布鲁斯·欧文斯(Bruce McCoy Owens)等学者整理的《喜马拉雅区域的历史与文化文献目录》,该书目录收录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有关喜马拉雅区域的成果,据该书目所载,“本书目包含约7000项有关喜马拉雅区域各民族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6](P.1)}。这份长达数百页的资料由两卷组成,第一卷以历史、人类学及相关社会科学为主题;第二卷以艺术、发展、语言学、游记、词典、文献目录为主题,反映出国际喜马拉雅研究成果丰硕,且是跨学科的。数以百计的研究人员或记录者来自人文社会科学、艺术等多学科,研究者包括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美国等诸多欧美国家,也包括喜马拉雅区域的印度、尼泊尔等国学者以及日本等东亚学者,出版的学术作品也是多语言的。

二、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喜马拉雅人类学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格局发生变化,西方殖民势力在喜马拉雅区域走向衰退,该区域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民族国家纷纷独立。1947年英国退出印度,将政权分别移交给印度斯坦的国大党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联盟,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均获得自治领权利,实现印巴分治。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中印边界纠纷悬而未决。20世纪50-60年代,在战后冷战世界格局中,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使喜马拉雅地区成为战后国际关注的热点地区,也吸引着许多人类学者进入该区域进行研究。

二战以后,人类学迎来了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喜马拉雅研究,正如学者戴夫·贝因(Dave Beine)所评论的,研究者们小心回避殖民主义陷阱,博厄斯(Franz Boas)“现代”人类学开启更强调“经验研究”和民族志的科学性。后博厄斯时代,喜马拉雅人类学民族志也深受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生态人类学的影响,呈现出经验性研究(empirical)的特点。1967年海门道夫对夏尔巴人的研究是尼泊尔人类学发展的标志,其《尼泊尔的夏尔巴:佛教高地之人》一书将尼泊尔人类学研究带入现代人类学的时代。此后该学科在尼泊尔得到快速发展,并奠定了尼泊尔人类学范

式。^{[7] (P. 163)}

除了像图齐这样对中国藏地研究成果丰硕的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在喜马拉雅区域开展田野研究,形成一个以研究喜马拉雅区域各族群宗教及社会文化的学术圈,也即喜马拉雅研究,或“喜马拉雅人类学”^[8]。哥伦比亚大学南亚研究所开设系列喜马拉雅研究课程,整理了《喜马拉雅区域的历史与文化文献目录》,该书书目整理项目就是在印度研究专家安斯利·恩布里(Ainslie T. Embree)和人类学家威廉·F·菲舍尔(William F. Fisher)的倡导下开展的,书目涉及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2799项(艺术、语言学不包括在其中),分为民族志及地理学作品总论、农业、人口、经济、民俗、体质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和政治学、宗教与神话、社会结构九大类。在这些喜马拉雅人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中,路易·杜蒙(Louis Dumont)对印度种姓制度的研究;冯·C·菲勒尔·海门道夫(Furer Haimendorf)对尼泊尔夏尔巴经济生活的研究;梅尔文·C·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对西藏、印度、尼泊尔藏民社会宗教、政治、一妻多夫婚姻家庭及生育制度的研究;弗里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对喜马拉雅山区斯瓦特(Swat)社会的民族志及斯瓦特中帕坦人的政治领导力的研究;出生于奥地利的多产学者耶特马尔·卡尔(Jettmar, Karl)对喜马拉雅山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研究;印度学者马丹·崔洛克·纳特(Madan Triloki Nath)对克什米尔婚姻家庭及亲属制度的研究;印度人类学家雷格胡维尔·辛哈对喜马拉雅南麓的宗教研究等成果在人类学领域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

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Louis Dumont)对尼泊尔与印度的婚姻做过比较研究,所撰《尼泊尔与印度的比较:尼瓦人及其他族群》被收入印度社会学会《印度的婚姻:问题的现状》一书中。^{[8] (P. 90-98)} 杜蒙的人类学研究以其对印度社会阶层的研究最负盛名。在其所著《阶序人:种姓制度随笔》一书中,他对印度种姓制度中洁净与不洁所衍生的社会等级进行研究,^[9] 他的研究改变了人类学以往只重人的行为不重人的观点的研究,指出用体系的眼光看待种姓制,才能洞察行为背后的意识形态。^[9] 基于印度和尼泊尔丰富的民族志资料,杜蒙把列维-斯特劳斯“对立两分”式的结构主义信条发展成“等级化对立两分”式的结构主义,正如学者评论的,“杜蒙式的结构主义理论总

是比列维-斯特劳斯式的更多些具体性而少些普遍概化的东西”^{[10] (P. 292)}。

在众多喜马拉雅人类学研究中,冯·C·菲勒尔·海门道夫(Furer - Haimendorf, Christoph von)的成果较丰富。奥地利人海门道夫在博士论文中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对印度阿萨姆地区和缅甸西北的山区部落社会进行比较研究,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1936-1937年间得以在印度那加山区的康亚克部落中开展田野研究,此后长期在印度部落中做田野。海门道夫伉俪先后调查了海德拉巴王国德干山区琴楚人的社会组织和生计模式,野牛山区雷迪人的文化适应研究,在阿迪拉巴德地区调查贡德人的文化,最后深入到更为偏远封闭的喜马拉雅山东部的阿帕塔尼人中做调查,在选田野调查点时注意选择不同生存环境,不同生计类型的部落,以求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到印度部落社会文化生活的全貌。在对印度部落的长期调查中,海门道夫的调查对象既有处于山区以采集狩猎为生的琴楚人,也有峡谷中传统轮作部落的雷迪人,同时还有农耕部落的贡德人和未受外部权力干预的阿帕塔尼人。^{[11] (P. 195)} 海门道夫是“第一位深入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夏尔巴人中从事田野调查的西方学者”^{[12] (P. 233)}。在近50年艰辛的田野工作中,他撰写了大量的印度和尼泊尔部落社会的民族志资料,先后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喜马拉雅区域印度、尼泊尔社会文化的人类学作品,如《印度土著部落》、^[10]《喜马拉雅的蛮境》、^[11]《印度和尼泊尔部落、印度教、佛教诸社会中的自由与控制》、^[12]《道德与体面:南亚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控制》^[13]以及《尼泊尔喜马拉雅地区的人口研究》、《尼泊尔的古伦族——乡村社会里的冲突和变化》、《多元化的社会——对雷布查旅的研究》。^{[13] (P. 72)} 此外,据苏发祥教授整理,海门道夫先后撰写和出版了十多本有关印度及其喜马拉雅山地区人类学研究的著作,受到国际人类学界的一致高度评价,其代表作有《赤裸的纳加人》、《尼泊尔的夏尔巴:佛教高地之人》、《转型的夏尔巴人:尼泊尔佛教社会的社会变迁》。^{[12] (P. 233)} 而据哥伦比亚大学整理的《喜马拉雅区域的历史与文化书目》,海门道夫研究喜马拉雅区域的相关文章、著作发表成果达40余项,海门道夫以其深厚的喜马拉雅人类学研究奠定了他在世界人类学领域中的学术地位,并创立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人类学系。海门道夫的作品也曾被中国人类学界关注。

20世纪80年代,吴泽霖先生曾翻译海门道夫所著《阿帕塔尼人和他们的邻族——喜马拉雅山东部的一个原始社会》^⑭以及《尼泊尔舍尔巴的经济生活——喜马拉雅山区的贸易者(一至四章)》,遗憾的是这两部译作只印刷了油印本,未能正式出版。^⑮

梅尔文·C·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是美国人类学界从事藏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被称为“世界一流的西藏研究专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戈尔斯坦曾撰写《西藏的僧兵(Ldab - ldod)研究》等学位论文,1968年,他以《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论文,获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戈尔斯坦主要从事中国西藏社会、历史、当代政治、人口及一妻多夫婚姻制度研究,也在尼泊尔西北与西藏交界的利米(Limi)社会进行研究,并在印度开展流亡藏人的研究。利米是位于尼泊尔西北部与西藏交界的一条峡谷,是联通西藏、尼泊尔和印度的重要商贸通道,居民讲藏语,在戈尔斯坦看来,“利米的居民具有双重的东方国民性。语言和文化上,他们完全属于藏族,但在历史与政治上,早在好几个世纪以前,至少可以追溯到朱穆那·马拉(Jumla Malla)国王时代,利米就和尼泊尔有了联系。实际上,尽管利米在米·卡拉尔(Mi Khral)时期有向西藏缴纳人头税的传统,但更重要的是在萨卡拉尔(Sa Khral)时期,利米要向尼泊尔缴纳土地税。”^{[14](P.114)}1961年中国与尼泊尔签订边界协议,利米划入尼泊尔。这一新的政治归属改变了利米居民以往可以在中国藏区的游牧点放牧的传统,影响了他们的牲畜饲养数量,同时加强了与印度的贸易关系,并使得传统的一妻多夫婚姻制度走向瓦解。戈尔斯坦对利米社会的研究,展示了喜马拉雅高海拔山区的居民所采用的杂糅的适应策略和适应不同政治系统的内在动力。

20世纪80年代,戈尔斯坦在西藏考察两年,访问了定居在印度的藏人和原先在西藏任职的英国外交官,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大量引用英国外交部档案、伦敦、印度事务部档案和美国国家档案等,成为西方藏学界的“西藏通”。1989年戈尔斯坦以《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享誉西方学术界。^⑯该书详细叙述了1913-1951年西藏上层社会斗争史实,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失和、寺院集团和噶厦之间的冲突,剖析了西藏现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产生的

原因、发展过程及其影响等。该书2005年被译为中文出版,在学术界和公众中产生影响。^⑰戈尔斯坦所编的《现代藏语藏英词典》也给他带来了极高声誉。

喜马拉雅山地生活着众多族群,这些族群的语言、婚姻、亲属结构、节日、传说的社会文化多样性及其社会文化变迁成为喜马拉雅人类学中研究的重要主题,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也颇具人类学传统。如早在1926年就有学者艾克斯特德(Eickstedt E. von.)撰写《西部、中部喜马拉雅的种族与类型》关注喜马拉雅区域的多族群状况。^{[15](P.1-38)}据哥伦比亚大学南亚研究所的《喜马拉雅区域的历史与文化文献目录》所载,这些被人类学民族学家们研究过的族群主要有:喜马拉雅斯瓦特地区(Swat 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巴坦人(Pathan)、俾路支人(Baluch)、普什图人(Pashtun);喜马拉雅克什米尔地区的拉达克人(Ladakh)、加迪人(Gaddi)、塔鲁人(Tharu)、白瓦人(Bawar);西北印度喜马拉雅地区(喜马偕尔邦,旁遮普邦,北方邦)的加迪人(Gaddi)、塔鲁人(Tharu)、阿赫人(Ahir)、库鲁人(Kulu);印度东北阿萨姆(Assam)山区和纳加高地(Nagaland)的部落社会,如阿博/阿迪人(Abor/Adi)、噶若人(Garo)、卡西人(Khasi)、纳加人(Naga)、雅鲁藏布人(Tsangpo)、米佐人(Mizo)、普南(Pnar)、掸人(Shan)、拉巴人(Rabha)、迪玛萨人(Dimasa)、阿萨姆的穆斯林(Assam Muslims);尼泊尔的夏尔巴人(Sherpa)、萨哈人(Sajha)、菩提亚人(Bhotiya)、利米人(Limi)、古龙人(Gurung)、林巴斯人(Limbus)、玛加尔人(Magar)、尼瓦尔人(Newar)、帕哈里人(Pahari)、莱人(Rai)、塔芒人(Tamang)、塔卡里人(Thakali)、塔鲁人(Tharu);不丹的里普查人(Lepcha)、不丹藏人;锡金(Sikkim)的里普查人(Lepcha)等达数十种之多。海门道夫对尼泊尔夏尔巴人长期的研究,^⑱戈尔斯坦对尼泊尔利米人的研究可谓西方人类学对喜马拉雅区域族群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喜马拉雅山地的多族群区域,激发了人类学家对族群身份、族群关系以及族群认同的理论探索,在族群理论领域以提出族群边界论著称的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就是从斯瓦特巴坦人(Swat Pathan)的田野研究出发,来讨论政治过程对族群身份及其认同变迁的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始,巴特就在喜马拉雅区域巴基斯坦斯瓦特人(Swat)社会进行研究,1956年在

奥斯陆出版《印度教徒与斯瓦特科希斯坦人：民族志调查》。^①其所撰《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人的社会分层制度》一文被收入利奇(Edmund R. Leach)主编的《南印度、锡兰及巴基斯坦西北的种姓制》论文集中。^{[16] [P. 113-146]} 巴特对斯瓦特政治结构的研究成为喜马拉雅区域中讨论政治人类学的范例,1959年巴特的博士论文《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领导》在伦敦出版,^②中译版《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于2005年出版,该书是巴特对20世纪50年代所观察到的斯瓦特人的政治组织结构的记录,“重点是对政治权力及其行使这些权力的组织形式进行分析”^{[17] [P. 1]}。该书描述了斯瓦特巴坦人各社会群体的关系,包括血缘的、政治的、宗教的关系及其政治互动过程的基本政治结构。更重要的是,作者建立起一个用于分析复杂的日常生活现象的理论模型,提供了一套人类学研究方法,即从微观层次的观察来发现其与宏观层次间的联系,并研究宏观层次的理论问题。

在弗里德里克·巴特享誉世界的《族群与边界》一书中,喜马拉雅区域斯瓦特巴坦人的民族志始终是他提炼族群边界理论的案例和素材。比如在讨论族群文化边界维持时,他指出以往文化融合具有普遍性的观点认为人群之间在生态适应和经济模式上存在共性就会产生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共性,文化融合就会发生。然而,从斯瓦特巴坦人的案例来看这种观点可能是错误的,巴坦族群的边界跨越生态与政治单元,“如果把自我认同作为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准,对于巴坦人这类小族群可能是最适合不过了,它可以把巴坦人认定为俾路支部落的成员并承担成员的政治义务,或者,也可依据在农业和畜牧业实践方面的共性而把巴坦人认定为科伊斯坦尼部落的一分子,甚至,也可继续称他们自己为巴坦人。”^{[18] [P. 9-38]} 因而,巴坦人的案例说明社会组织 and 制度并不一定能产生族群区分,族群边界和边界维持才得以产生族群和族群认同。

婚姻家庭亲属制度研究是社会人类学的经典主题,喜马拉雅区域不同族群和社会结构在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方面表现出极大差异,母系世系和一妻多夫家庭在这一区域普遍存在引发诸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戈尔斯坦撰写《卫藏的等级制度、一妻多夫制与家庭结构》,施耐德(David Schneider)编《母系制亲属关系的研究》论文集,南

希·列维尼(Nancy Levine)著有《尼泊尔藏族一妻多夫制中父子间亲属关系的价值及其确认》等。^②其中,受训于西方的印度籍人类学家们在这一主题的研究中起着特殊作用,印度学者马丹·催洛克·纳特(Madan Triloki Nath)对克什米尔潘迪人(Pandits)婚姻家庭及亲属制度的研究最有代表性。马丹1933年出生于印控克什米尔,1960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博士,为印度德里大学荣誉教授。因出生、成长在克什米尔,马丹对研究克什米尔的土著族群研究有语言优势,因而能够开展亲属称谓、亲属结构的研究。1953年他发表《克什米尔潘迪人的亲属称谓》,而他最著名的著作《克什米尔乡村潘迪人的家庭与亲属制度》叙述了潘迪人的社会生活。2010年当马丹的新著《欧姆尼巴斯：印度教一家之主》出版时,牛津大学出版社对他的学术评介道：半个多世纪以来,T. N. 马丹犹如巨擘一直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家庭和亲属制度、发展、宗教、世俗主义,以及印度教社会和传统文化的研究产生影响。他出版于1965年的《克什米尔乡村潘迪人的家庭和亲属制度》一书仍是关于克什米尔潘迪人民族志的开拓之作,被认为是世界人类学领域的经典之作。^②

宗教一直是喜马拉雅研究中的核心议题,除了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外,一些学者主要关注该区域人种、族群的多样性及其宗教、社会文化的差异,如印度学者雷格胡维尔·辛哈对生活于印度东北边境特区^③的阿卡、阿迪、达夫拉、布根等部族进行研究,将这些人群分为信仰佛教的社会和信仰原始宗教的社会,在其《喜马拉雅南麓的宗教与文化》一书中,对印度东北部文化区大概30个不同部落说50种不同方言的人群进行研究,作者认为这些人群“分布在大约三万平方英里即我称之为一个连续的文化带上,除了那些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佛教,并遵循着佛教传统的部落外,这里的每个部落都有其持续多年的未受任何文明特性影响的特殊宗教,如自然崇拜或灵魂信仰……他们有一种全然束缚自己并祈求超自然神灵信赖自己的基本宗教哲学”^{[19] [P. 7]}。辛哈试图把他们整个宗教作为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并用这些原始宗教与马林诺斯基的《巫术、科学和宗教》、普里查德的《阿赞德人的魔法、巫术和神谕》进行关联性讨论。

此外,1956年出版的(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著《西藏的神灵和鬼怪》因被

翻译成中文出版而为中国学者熟知。²⁴再有如贝热曼·杰拉德(Berremen, Gerald. D.) 所著的《喜马拉雅区域的印度教》²⁵, 涉及该区域的印度教, 反映出该区域宗教信仰的多样态。

三、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喜马拉雅人类学研究

后现代以来文化多元再次成为人类学的价值取向, 与多学科的交叉产生出许多新的研究主题。同时, 人类学领域的反身性(reflective) 思考成为主流, 使得喜马拉雅人类学研究开始反思不同模式的民族志分析, 包括象征人类学和后现代主义。喜马拉雅人类学的民族志作品也成为检讨文化霸权和后殖民批评的场域。

2014 年, 英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院士, 皇家人类学会院士, 原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人类学家、荣誉教授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 计划举办一个小型活动以纪念他在尼泊尔古龙(Gurung) 塔克(Thak) 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40 周年。早年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时艾伦·麦克法兰曾师从海门道夫, 1976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资源与人口: 尼泊尔古龙人研究》²⁶, 这是这位历史学家基于喜马拉雅山地开展田野研究后的人类学著作。此后, 尽管他在喜马拉雅的田野研究时断时续, 但喜马拉雅区域人类学作品的整理、集结、出版工作仍在继续, 他与朱利安·雅各布斯(Julian Jacobs) 合作、配有 700 幅照片的《纳加人: 印度东北的山地族群》一书于 1990 年出版²⁷, 影像与多媒体技术可以重新再现喜马拉雅多族群鲜活的社会文化。2000 年由艾伦·麦克法兰教授和马克·都灵(Mark Turin) 设计的数字喜马拉雅项目在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启动, 2005 以后该项目转移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 2014 年移至中国四川大学。数字喜马拉雅项目旨在用数字化技术来收藏和展示从喜马拉雅地区获得的人类学档案、影像资料, 创建了数字喜马拉雅网页。目前收藏有海门道夫的电影藏品系列, 尼泊尔的人口、尼泊尔的鸟类以及档案、手稿等类目。数字喜马拉雅项目可谓展现了数字、影像版的人类学喜马拉雅研究学术史。

喜马拉雅区域成就了一批批人类学家们的学术事业,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喜马拉雅区域的人类学事业仍在继续创造理论范式或对人类发展的世界议题做出区域性回应。这些议题包括人类生

态与环境、旅游人类学、象征人类学的相关研究以及喜马拉雅区域的发展研究议题、全球化等。一些功成名就的人类学家继续在喜马拉雅区域拓展学术生涯中新的具有挑战性的主题, 一些后起之秀在喜马拉雅人类学研究中也获得事业的巅峰之作。

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的生态环境挑战着人类的生存极限, 这些族群和社会如何适应环境获得生存? 如何通过宗教等文化技术来处理他们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保持环境与心灵之间的和谐? 诸如此类的问题始终是人类学家们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尽管 20 世纪 60-70 年代已有学者开始讨论喜马拉雅的生态议题, 如 1976 年密歇根大学有博士论文《交互模式: 尼泊尔喜马拉雅的人口、生态与社会》²⁸, 然而, 1980 年, 戈尔斯坦在《人类生态环境》杂志发表《纬度性在喜马拉雅山脉生态系统中的意义》²⁹ 以及在《美国人类学家》等刊物发表《尼泊尔西北的兄弟共妻: 社会生物学理论的检验》³⁰、《神话与现实: 喜马拉雅高海拔对生殖力和生育的影响》³¹ 等系列文章掀起了喜马拉雅人类学对社会文化生态议题的关注, 并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喜马拉雅研究中最有吸引力的议题。尼泊尔人类学者古龙(Ganesh Man Gurung) 撰《一妻多夫、适应性和环境: 以尼泊尔喜马拉雅村堂金(Tangin) 为例》^{[20] P. 175-182} 此外, 在尼泊尔出版较有影响的喜马拉雅研究学术期刊《尼泊尔研究贡献》(Contributions to Nepali Studies)³², 于 2006 年出版了“环境与发展”专辑, 该辑收录了拉姆·B. 刹帝利(Ram B. Chhetri) 所撰《尼泊尔变化中的环境与生计: 一个回顾》等 6 篇论文, 讨论尼泊尔不同族群生计方式对环境变化和发展的应对与适应。

20 世纪 80 年代, 旅游作为后现代工业形式在喜马拉雅山区获得迅猛发展, 在当地社区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喜马拉雅区域的众多山峰和地景不仅是苯教、佛教徒的圣地, 也成为登山运动和背包客们的旅游目的地, 那些善于登山、始终与攀登打交道的喜马拉雅山区村民也经历着从土著山民到登山向导和导游的职业转换, 喜马拉雅旅游也成为旅游人类学检讨东道主与游客、朝圣与旅游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的案例。考尔·杰格迪什(Kaur Jagdish) 的《喜马拉雅朝圣和新旅游业》³³、雪莉·奥特纳(Sherry B. Ortner) 《生与死在珠峰: 夏尔巴人和喜马拉雅登山》³⁴、林克宜(Francis

Khek Gee Lim)《作为权力之地的旅馆:喜马拉雅尼泊尔的旅游、地位和政治》^{[21] (P. 721-738)} 可谓这一主题的代表作。目前就职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林克宜(Francis Khek Gee Lim)博士是喜马拉雅研究的后起之秀,他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研究期间就到尼泊尔与西藏交界的郎塘(Langtang)村说藏语的塔芒人(Tamang)社会进行田野研究,主要考察基督教在喜马拉雅尼泊尔区域的传播。该文从尼泊尔的旅馆入手,反思尼泊尔旅游与发展,正如文中所说“这是一篇有关旅馆对喜马拉雅尼泊尔文化意义的文章。我将表明,旅馆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物质空间,通过它把发展的意识形态弥漫于当下尼泊尔社会并被具化为人们的一种日常生活”^{[22] (P. 722)}。

女权主义人类学家雪莉·奥特纳自20世纪60年代就进入喜马拉雅夏尔巴人社会进行田野研究,夏尔巴人社会中的萨满、藏传佛教僧侣以及社区中的仪式专家曾是她关注的主要问题,夏尔巴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及其《通过仪式看夏尔巴人》、《高地宗教:夏尔巴人佛教的文化与政治史》等作品成就了她在象征人类学、宗教人类学领域的学术地位。^⑤1996年5月10日发生在珠峰因暴风雪引发的重大山难事件,激发奥特纳再次审视喜马拉雅社区作为村民和作为登山向导的夏尔巴人,在《生与死在珠峰:夏尔巴人和喜马拉雅登山》一书中,奥特纳追溯在珠峰山谷和山脚下居住的夏尔巴人及其在登山探险中的角色,过去100年里随着登山探险队的涌入,夏尔巴人成为外来登山者负载重物的苦力、沉默的陪伴者或登山向导。攀登珠峰是一项风险极大的运动,夏尔巴向导们也卷入登山风险中。“从1950年到1989年,有84位夏尔巴人死于登山探险”^{[23] (P. 6)},作者访谈了30余位夏尔巴登山者,站在夏尔巴人的立场,分析夏尔巴人参与登山探险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以及他们与西方探险者在登山过程中结成的关系,并探讨登山对他们的传统文化、宗教和身份的影响。该书获得人类学界的广泛好评。

四、喜马拉雅人类学为人类学贡献了什么?

回顾喜马拉雅人类学300余年的学术史,经历了从18世纪晚期至20世纪上半叶的东方学范式,到20世纪50-80年代以结构-功能为主的现代人类学范式,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多元文化范式。该区域多族群社会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意识形态和研究理论方法路径

下,得到系统、持续的记录、分析、阐释和反思,留下一系列喜马拉雅人类学学术遗产,可概括为:

其一,藏传佛教梵文搜集整理研究。欧美佛教研究中存在印度学传统、藏学传统,1824年英国官员何德逊(Brian Hodgson)、法国学者布奴夫(Eugene Burnouf)、意大利图齐(Tucci)在尼泊尔、西藏等地搜集梵文写经数百卷。被尊为“欧洲佛教研究之父”的布奴夫出版巴利语法书,奠定了“梵巴汉藏”的佛教文献学基础。^{[4] (P. 2-3)}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留下了佛教文字、经典研究的东方学遗产。

其二,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发展。自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放弃历史进化论,把“功能主义”带进人类学,人类学分析的关注范围就从起源和历史问题转移到结构和相互联系问题上,成为人类学的新范本。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无论是非洲、大洋洲还是美洲,都采用这样的范本来进行研究。喜马拉雅人类学也不例外,在人类学的亲属制度研究、一妻多夫婚姻制度研究以及杜蒙式结构主义方面有所发展,可以说喜马拉雅人类学为人类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及动态分析发展提供了多种经验和案例。

其三,反思东方学、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喜马拉雅区域是西方殖民势力对亚洲区域进行殖民统治最早、最深入的地区,也是人类学领域反思、检讨殖民主义的重要区域。后现代以来,许多人类学家通过自己的行动,努力弥补以往殖民历史与该区域社会间的张力。除了上文提及的雪莉·奥特纳站在夏尔巴人的立场审视珠峰登山者与夏尔巴人的关系以外,剑桥大学的麦克法兰教授还通过与古龙学者的长期合作,不仅招收多名尼泊尔籍学生,如泰克·古龙(Tek Gurung)和艾尔·卡古龙(Alka Gurung),为尼泊尔培养了青年一代人类学者,而且还与多位古龙学者合作著书,其中与尼泊尔古龙人学者英扎巴哈德·古龙(Indrabahadur Gurung)合著《古龙社会简介》^⑥,把人类学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发展为学术合作者,可谓喜马拉雅人类学中的典范。

其四,多元文化主义对人类的意义。喜马拉雅区域是多种文明交汇地,经过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浸润,至今仍是世界上生态-社会文化最具多样性的区域,这一遗产对未来人类社会的走向仍具有深刻意义。当下中国社会特别是中产阶级社会兴起的藏传佛教热文化现

象,不丹的幸福指数,文化-生态多样性的尼泊尔对当今中国人都产生了磁铁般的吸引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印度,中印两国将开辟一条从中印边界东段经乃堆拉山口到日喀则,然后通往普兰县的新朝圣大道,方便印度朝圣者进入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境内的“圣湖”玛旁雍错与“神山”冈仁波齐朝圣。^⑦研究中印关系的印度华裔专家谭中指出,中印两国集世界文明大成,喜马拉雅在召唤中印两国应该用地缘文明(geo-civilization)的范式来“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⑧,表明喜马拉雅区域多元文化主义充满人类文明的智慧,具有超越民族国家政治架构意义,正如好莱坞电影《2012》中那艘建在喜马拉雅的诺亚方舟,将人类载向未来。

(感谢英国剑桥大学 Alan Macfarlane 教授 10 年前赠送我的 *The Nagas: Hillpeoples of Northeast India* 一书,这本装帧精美、有 700 幅图片的书引发了我对喜马拉雅研究的兴趣。)

注释:

①据哥伦比亚大学布鲁斯·欧文斯(Bruce McCoy Owens)等学者整理的《喜马拉雅区域的历史与文化文献目录》所载。Bruce McCoy Owens, Theodore Riccardi, Jr., Todd Thornton Lewis: Bibliography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Himalayan Region, Southern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②Kirkpatrick, W., An 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Nepal Being the Substance of Observation Made During A Mission to Thant Country, in the Year 1793 (1811), London: W. Miller, 1969 reprint.

③Brownrigg, H. S. Routes in Nepal, Bhutan Tibet, Sikkim, Burma Between Assam and Burma. Calcutta: 1878.

④Crooke, William. “The Hill Tribes of the Central Indian Hill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Institute; 1899; 28: 220-48.

⑤Graham, J. A. On the Threshold of Three Closed Lands: The Guild Outpost in the Eastern Himalayas. Edinburgh: Clark; 1897.

⑥Wilson Andrew, The Abode of Snow: Observations of a Journey from Chinese Tibet to the Indian Caucasus Through the Upper Valleys of Himalayas.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1875.

⑦Eickstedt, Egon V. The Races and Types of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Himalayas. Man in India; 1926, 6(4).

⑧见 William J. Fisher, Ed. Himalayan Anthropology: The Indo-Tibetan Interface. The Hague, Paris: Mouton; 1978.

⑨Louis Dumont, Homo Hierarchicus: An Essay on the Caste Syst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0.

⑩Furer - Haimendorf, Christoph von, The Aboriginal Tribes of India (Birdwood Memorial Lecture).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 1950; 98: 997-1011.

⑪冯 C. 菲勒尔 - 海门道夫《喜马拉雅的蛮境》,伦敦约翰穆勒出版社 1955 年。

⑫该研究曾荣获温纳格林人类学研究基金的资助。

⑬Furer - Haimendorf, C. von, *Morals and Merit: A Study of Values and Social Controls in South Asian Societies* London: Weidenfield and Nicholson, 1967.

⑭克里斯托夫·冯·菲尤勒 - 海门道夫著《阿帕塔尼人和他们的邻族——喜马拉雅山东部的一个原始社会》,吴泽霖译,(油印),1980年1月北京。

⑮克里斯托夫·冯·菲尤勒 - 海门道夫著《尼泊尔舍尔巴的经济生活——喜马拉雅山区的贸易者(一至四章)》,吴泽霖译,(油印),出版社:不详,出版时间:1979年7月。

⑯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⑰[美]梅尔文·C·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⑱Furer - Haimendorf, C. von, *Between the Tree-Line and the Snow: The Hardy Sherpas of the Everest Region*.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July 30 1955; 226: 1042-1044; *The Role of the Monastery in Sherpa*, Sherpa Society. Ethnologica; 1960; 12-28; *The Sherpas of Nepal: Buddhist Highlanders*. London: J. Murray; 1964 etc.

⑲Fredrik Barth, *Indus and Swat Kohistan: An Ethnographic Survey*. Oslo: Forende Trykkerier; 1956.

⑳Fredrik Barth, *Political Leadership among Swat Pathans*. London: Athlone Press, 1959.

㉑参见南希·列维尼《尼泊尔藏族一妻多夫制中父子间亲属关系的价值及其确认》载于《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三辑)。

㉒<http://biblio.co.uk/book/tn-madan-omnibus-hindu-householder-tn/d/436223009>.

㉓印度东北边境特区,即麦克马洪线以南约九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曾属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门隅、洛渝、察隅的大部分地方,1970年代印度在该特区设阿鲁那查尔邦。

㉔[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著《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谢继胜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㉕Berreman, Gerald. D. *Hindus of the Himalayas*.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㉖Alan Macfarlane, *Resources and Population: A study of the Gurungs of Nep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㉗Julian Jacobs with Alan Macfarlane, Sarah Harrison and Anita Herle, *The Nagas: Hillpeoples of Northeast India*, Edition Hansjog Mayer, P. O. Box 13 11 13, 7000 Stuttgart I.

㉘Poffenberger, M.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Demography, Ecology and Society in the Nepal Himalaya*.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6.

㉙Melvyn C. Goldstein and Messerschmidt, D. A., “The Significance of Latitudinality in Himalayan Mountain Ecosystems”, *Human Ecology*; 1980; 8(2).

㉚Beall, C. M.; Goldstein, M. C. *Fraternal Polyandry in North-west Nepal: A Test of Socio-Biological Theor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81; 83(1): 5-12.

㉛Goldstein, Melvyn C. and Cynthia M. Beall. “The Effect of High Altitude on Fecundity and Fertility in the Himalayas: Myths and Realities”. *Contributions to Nepalese Studies*; December 1982 and June 1983; 10(1-2): 21-42.

㉜该期刊创刊于1973年,一直以来是喜马拉雅研究中较有影响的学术期刊。由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大学(Centre for

Nepal and Asian Studie) “尼泊尔及亚洲研究中心”(CNAS)出版,至2006年共出版33辑。印数少,很难获得,只有极少数的大学图书馆能配齐完整的一套。数字喜马拉雅项目将其数字化,发布在网站,可免费下载。

③Kaur, Jagdish. *Himalayan Pilgrimages and the New Tourism*. New Delhi; Himalayan; 1985

④Sherry B. Ortner, *Life and Death on Mt. Everest: Sherpas and Himalayan Mountaineer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⑤Sherry B. Ortner, *Sherpas through their Ritua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ST edition, 1978; And *High Religion: 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Sherpa Buddh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⑥Pratyoush Onta, “Interview with Alan Macfarlane”, <http://www.alanmacfarlane.com/FILES/alanrev2.htm>, 3 April 2003.

⑦谭中《习近平访印料形成中印伙伴合作新高潮》,《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09月12日 <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rt/tan-zhong/story20140912-388143>。

⑧谭中《中国与印度“巩固睦邻友好”的前景》,《新加坡联合早报》2013年11月28日 <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rt/tan-zhong/story20131128-281882>。

参考文献:

[1] Dave Beine, “Nepal – Then and Now: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Ethnography of Nepal”, *Contributions to Nepali Studies*, Vol. 25, No. 2 (July 1998).

[2] B. H. Hodgson, *Essays on th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s of Nepal and Tibet* (1874), 转引自 Dave Beine, “Nepal – Then and Now: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Ethnography of Nepal”, *Contributions to Nepali Studies*, Vol. 25, No. 2 (July 1998).

[3] Hodgson, B. H. “On the Aborigines of the Sub – Himalayas”.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847.

[4] 李四龙. 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5] 魏正中, 萨尔吉编译. 探寻西藏的心灵——图齐及其西藏行迹[M]. 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出版, 2009.

[6] Bruce McCoy Owens, Theodore Riccardi, Jr., Todd Thornton Lewis: *Bibliography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Himalayan Region*, Southern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7] Dave Beine, “Nepal – Then and Now: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Ethnography of Nepal”, *Contributions to Nepali Studies*, Vol. 25, No. 2 (July 1998).

[8] Louis Dumont, *Nepal Compared to India: The Newar and Others*. In: *Marriage in India: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Question*. Contri-

butions to *Indian Sociology*; March 1964; 7.

[9] 梁永佳. 路易·杜蒙论印度种姓制[J]. *民俗研究*, 2005 (1).

[10] [挪威] 弗雷德里克·巴特等. 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M]. 高丙中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11] 温士贤. 田野中的故事与故事中的田野——读《在印度部落中生活——一位人类学家的自传》[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3).

[12] 苏发祥. 英国藏学研究概述[J]. *中国藏学*, 2008(3).

[13] 满莹. 尼泊尔和喜马拉雅人类学评介[J]. *南亚研究季刊*, 1995(2).

[14] [美] 戈斯坦. 利米半农半牧的藏语族群对喜马拉雅山区的适应策略[J]. 坚赞才旦(何国强)译. *西藏研究*, 2002(3).

[15] Eickstedt, E. von. *The Races and Types of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Himalayas*. *Man in India*; October – December 1926; 6(4).

[16] Fredrik Barth, “The System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wat, North, Pakistan” in: Edmund R. Leach, Ed. *Aspects of Caste in South India, Ceylon and North West Pakistan*.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0.

[17] [挪威] 弗里德里克·巴特. 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 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M]. 黄建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8] Fred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ergen: Universitetsforlag and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69.

[19] [印度] 雷格胡维尔·辛哈. 喜马拉雅南麓的宗教与文化[M]. 伍昆明, 李坚尚译.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室, 1984.

[20] Ganesh Man Gurung, Polyandry, Adaptability and Environment: A Case Study of Tangin, A Himalayan Village in Nepal, *Journal of Contributions to Nepali Studies*, Volume 20, Number 2, July 1993.

[21] Francis Khek Gee Lim “Hotels as Sites of Power: Tourism, Status and Politics in Nepal Himalaya”,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 S.) 13, 2007.

[22] Francis Khek Gee Lim “Hotels as Sites of Power: Tourism, Status and Politics in Nepal Himalaya”,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 S.) 13, 2007.

[23] Sherry B. Ortner, *Life and Death on Mt. Everest: Sherpas and Himalayan Mountaineer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收稿日期 2015-05-30 责任编辑 李克建